

明清经济史领域的新成果

—读《明清社会经济结构》

罗冬阳 赵 毅

《明清社会经济结构》(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是姜守鹏教授积十余年研究与教学之心得,贡献给史学界的一部学术新作。

明清经济史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域,学者们致力甚多。尤其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数以百千计的论文和十数部著作,相继面世。在如此众多的论著中,《结构》一书以其独具的特色,给人新颖的理论启示。

《结构》一书与专题研究著作的不同在于,它侧重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注重理论上的概括和分析,注重将逻辑的与历史的方法完满结合起来。因此,该书虽然是一部断代经济史专著,却具有通史的视野和理论的高度。这在断代经济史研究中是不多见的。

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理论既是社会科学的重要认识手段,又是其成果的十分重要的表现形式。缺乏理论,社会科学便不能在一代又一代人连续努力的基础上积累进步。可以说,没有理论也就没有社会科学。只有资料而无理论,资料就只是一堆断烂朝报。所以理论水平的高低,往往是社会科学认识水平的标尺。作为社会科学一门学科的历史学当然也不能例外。正因为如此,《结构》一开篇就对社会经济结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诸概念及其特征与表现形式作了严谨的理论概括。

作者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就是社会经济诸种因素,其中包括生产关系的因素,也包括生产力的因素,在一定的关联方式和比例关系下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又进一步阐述道:“用辩证法来观察世界,无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都是由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体系按一定比例、一定方式组成的。若干小体系组成一个大体系,若干大体系组成总的体系,组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组成宇宙。社会经济结构,就是指社会经济体系的各个要素,按一定形式、一定比例构成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多层次、多因素的有机整体。这一整体的第一层次,一般包括四个分结构,即生产结构、分配结构、交换结构和消费结构。其下,又可从不同侧面区分出下一层次的结构。比如生产结构,就可以区分出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区域结构、技术结构、经济组织结构、经营方式结构等等。再下,又有第三层、第四层的分结构。”(见《结构》第2页)

这种认识,比那种将社会经济结构笼统理解为生产关系的总和的理论,无疑要深刻得多。

作者还提醒道:“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经济结构,都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结构。我们所研究的封建社会,它既存在着其主体的封建经济结构,又存在着奴隶制经济结构的残余,同时,在它的晚期,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此,从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后,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经济结构,都是一种多方面多层次的经济结构。”(见《结构》第3页)

然后作者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提出了颇为独到的见解：“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小农经济。因为，第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主要是土地私有制，它包括自耕农所有制和地主所有制。自耕农经济无疑是属于小农经济范畴。地主虽拥有大块土地，但是他们却主要采取分散经营的方法，把大块土地分成许多小块，分别租给佃农。佃农经济亦属小农经济范畴。第二，无论是地主制经济，还是自耕农经济，其基本的生产结构都是小农生产。第三，无论是自耕农经济，还是地主制经济下的佃农经济的这种小农生产，又都具有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特点。”（见《结构》第4页）

史学界以往认为封建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而其突出的特点是耕织结合，亦即是一种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即使为社会提供商品，但卖是为了买，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取得交换价值，而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因此，小农虽然提供商品，但仍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结构》一书认为小农经济并非一种纯粹的自然经济，而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经济，这种认识，无疑突破了传统见解。作者进一步阐发他的新见解说：自耕农和佃农，“他们无论是怎样生产，甚至就是小农业密切和家庭手工业结合，也不可能生产出他们所需要的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们也必须把一部分生产品投入市场，以换取他们所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随着生产的发展，其商品性生产部分也日益增多。当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成为商品时，就连他们的自给性生产部分都被打上商品经济的烙印，更不用说其商品性生产部分了。”（《结构》第8页）

“这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小农经济，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经济，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商品经济，而是一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中商品经济越来越发展，自然经济越来越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讲，封建经济的发展，正表现为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结构》第4—5页）明清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突出体现为小农经济中商品性生产成分的发展。这种发展，既是资本主义萌芽发生的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见《结构》第7章论述），但又为其发展设下了先天的局限，使其长期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正如书中所说：“农民的这种商品生产，由于自给性生产为它做了底垫，因此，它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不仅影响着生产同样产品的独立的手工业的发展，也影响和阻碍着手工业与农业的脱离，影响着民营手工业的发展，民营手工业发展缓慢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结构》第366页）

《结构》一书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归结为小农经济，并将小农经济理解为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统一体，为深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前途提供了极富启发的理论视角。正如薛虹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我认为研究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经济应该着重分析其发展和繁荣的底盘——小农经济的下滑倾势。必须将两者（经济的繁荣与小农经济的下滑）结合起来，才算得上是封建社会晚期的经济，才能准确地表述封建社会晚期社会经济的本质及其潜在的危机。”

《结构》一书在进行明清社会经济结构的具体研究时，亦颇多创新，此篇小文不能一一介绍，只举一例，由此或可窥见全貌。

在对外贸易方面，明清政府，特别是清政府，是否实行过闭关自守的政策，学术界有过热烈讨论。传统的见解是明清政府都执行一条“闭关锁国”的外贸政策。近年有些学者认为，不能笼统将明清政府的外贸政策归之为闭关锁国，而是一种严格管理的开海贸易政策。《结构》一书无

疑是倾向于后种观点的,但又有自己的创新。作者认为,明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对中国商人到海外贸易的政策和对外国商人到中国经商的政策。这两方面的政策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我们在分析明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时,“要对这两个方面的政策进行综合分析,不能以一个方面代替全面。”(《结构》第238页)然后,作者把明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划分为四个时期: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明代“朝贡贸易”的逐渐民间化与隆庆的开禁;清初的海禁;乾嘉道时期有限制的发展的外贸政策。通过四个时期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的细致考察,作者得出结论:“明政府和清政府的外贸政策并不完全相同,就是明政府和清政府的外贸政策在各个时期也并非完全一致。但是总起来应该怎么看明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呢,我认为无论是明政府还是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都是一种有限制的发展的外贸政策。这种政策基本上适应了明清时期封建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它仍然是一种封建的经济政策,但不应称其为闭关锁国政策。它对外贸活动的某些限制,主要是对本国商人到外国经商的限制,这种限制无疑影响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限制明政府实行的时间比清政府实行的时间更长些,影响也就更大些。至于对外国商人到中国经商,虽然也有某些限制。但基本上没有超出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权范围。当然明朝前期,对外国民间商人来华贸易的限制,较之宋元是一种倒退,但也并非锁国。总的说来,这种限制明朝比清朝多些,各朝的前期较之后期限制得多些。”(《结构》第244页)

从作者的论述可以看出,作者是将明清政府的外贸政策放到当时的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从明清政府所面临的诸种问题及其政策发展变化的具体状况出发,对其认识和评价的,这将更合乎历史的实际。

《结构》一书十分注意对数量史料的搜集、分析和运用,尽可能做到量化分析。这种量化分析在书中随处可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足证作者用力之勤。量化分析与单纯的定性分析比较,更能科学地描绘事物的实际情况。如对明清时期农业亩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分析,即是如此。作者通过对有关史料的排比梳理和对前人成果的鉴别选择,推导得出宋代的亩产量为165斤,明代为245斤,清代为310斤,即明比宋的亩产量增加了48.5%,清比明增加了26.5%(《结构》第107页)。粮食的总产量也呈增长势头,明较宋增长96.5%,清较明增长了74.75%。但是与人口增长相比,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的增长速度,仍慢于人口增长速度。”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明代人们的消费水平较之宋代尚有可能稍微提高,而清代人们的消费水平不仅与明代相比没有提高,甚至与宋代相比也没有提高。宋代人均粮食为957斤,明代为1253.6斤,而清代却只有657.2斤。”(《结构》第299—300页)由此明显看出,虽然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仍在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中孕藏着严重的生产力要素结构的矛盾与危机。

《结构》一书还有一个值得特别提及的优点,就是注意总结学术界已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按学术观点分类阐述,然后再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一种诚实、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值得提倡。学术的进步是积累性的过程。只有在前人的基础上起步,又比前人有所创新,学术才能不断创新。不注意总结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不但使学术研究无法进步,导致重复无效劳动,而且因无法区分他人与自己的贡献所在而导致对他人劳动的不尊重,不免有掠美之嫌。这可能是似曾相识的文章在报刊上不断出现的最主要原因。

由于《结构》一书旨在对明清社会经济结构作一整体的、系统的研究,力求面面俱到,个别问题的论证尚感不足,史料发掘亦有不够深度之处。瑕不掩瑜,这都无关宏旨。总之,我们作为该书的读者,觉得《结构》是一部给人清新教益的成功之作。